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 斗拱形制分期研究

——兼论故宫午门及奉先殿角科斗拱形制年代

徐怡涛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文物建筑形制类型学研究方法，作者从明清官式建筑角科做法上，提炼出可用于形制分期的三组共 15 个形制类型及其组合关系，结合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了 43 座明清时期北京官式建筑标尺的角科形制类型和共存年代，通过角科斗拱的形制演变，勾勒出北京官式建筑在五百余年间所经历的六个演变历程，计为：元明交替期、明制转变期、明制成熟期、明清交替期、清制定型期和清末微变期。最后，作者利用角科形制分期结论，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故宫现存奉先殿、午门等建筑的年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明清 北京 官式建筑 角科 分期 故宫 奉先殿 午门 郭文英

一 研究背景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①角科斗拱形制的演变及其历史渊源，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上世纪30年代，刘敦桢先生考察北京智化寺后指出，明代角科斗拱上的鸳鸯交手及短翘做法，源自宋《营造法式》^②。余鸣谦先生在《谈明代斗拱的演变》^③一文中继承了刘先生的观点并指出，角科上的鸳鸯交手到“清代中叶才被搭角闹二昂、三昂以至多昂的做法代替”。郑连章先生在《紫禁城钟粹宫建造年代考

① 本文以北京地区具有五踩及以上角科斗拱的官式建筑为研究对象，同时吸收了部分北京以外的清代皇陵建筑(北京官式建筑类型和地域选择，参见郑欣淼：《故宫与故宫学》页179—180，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2月)。本文以建造及修缮历史可考、原构保存较好的案例为形制标尺，对其中一些年代存在争议的案例进行了专门的疏证，详见相关注释。

② 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3期，1932年9月。

③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实》¹¹中指出，明初角科闹上出短翘，嘉靖时发展为翘头半支拱身，雍正朝刊布《工程做法》时，角科上的鸳鸯交手已彻底消失，斜跳上一律采用搭角闹昂。郭华瑜先生在《十四至十七世纪中朝官式建筑大木做法若干问题研究》一文中亦指出，“中国明代建筑大多采用鸳鸯交首拱形式。少数建筑中有搭角闹头昂形式”¹²；她同时以角科用鸳鸯交手、弧形昂嘴而非清式马蹄形昂嘴，作为判断北京太庙大殿尚为明构的证据¹³。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总结出三组明清时期角科斗拱形制的已知演变脉络：一，明代角科斗拱盛行的鸳鸯交手至清代中期彻底消失。二，在角科斗拱的斜跳上，明初出短翘，明中期出半支横拱的短翘，同时明代亦存在少数搭角闹昂做法，清雍正以后，搭角闹昂彻底取代短翘。三，明代的昂嘴为弧形，清代为马蹄形。

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文物建筑形制类型学研究方法¹⁴，以标尺形制的系统排比，全面剖析形制演变规律，尝试建立形制演变分期，以加深我们对北京地区明清官式建筑历史演变的认识，并为地域间建筑形制的流变研究及相关历史研究构建可靠的时间框架。

二 形制排比提炼

宋《营造法式》定义了“列拱”的概念¹⁵，“凡拱至角相交出跳则谓之列拱”，列拱仅见于转角铺作，明清称为角科。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制最复杂的部分，而列拱又是斗拱中形制最复杂的部分。其具体形制为：泥道拱与华拱出跳相列，瓜子拱与小拱头出跳相列（平坐层之瓜子拱与华拱拱头相列）¹⁶，慢拱与切几头相列，角内足材下昂造即与华头子出跳相列，令拱与瓜子拱出跳相列。转角铺作正出与斜出跳头上的横拱，如在铺作身内相连，需在中心刻出拱头，称为做鸳鸯交手拱，“凡拱至角相连长两跳者，则当心施料，料底两面相交，隐出拱头，谓之鸳鸯交手拱”。

本文从《营造法式》及唐代以来的建筑实例中提炼出三组角科形制：斜跳搭角、昂嘴形状和横拱连身，各组形制的分型如下〔形制类型及形制组合示例见表一：1、2，图一：1~9〕。

〈1〉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2〉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3〉 郭华瑜：《北京太庙大殿建造年代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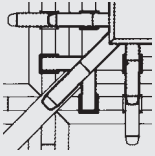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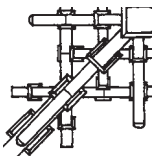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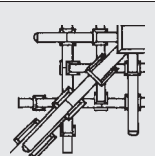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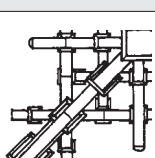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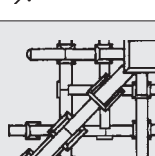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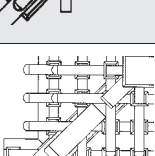
〈4〉 徐怡涛：《文物建筑形制类型学研究原理与单体建筑断代方法》，《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列拱和鸳鸯交手拱制度，详见《营造法式》卷四《造拱之制》，相关术语解释参见徐伯安：《〈营造法式〉斗拱形制解疑、探微》，《建筑史论文集》第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

〈6〉 宋《营造法式》卷四：“小拱头从心出，其长二十三分”，以三瓣卷杀，每瓣长三分；上施散料。若平坐铺作，即不用小拱头，却与华拱头相列。其华拱之上，皆累跳至令拱，於每跳当心上施耍头。”


1、角科斗栱的斜跳搭角作法可见四种基本形制：栱头、小栱头、切几头和昂头^①。再参照明清角科实例，小栱头可再分为三种亚型(B1、B1S、B2)，则本文用于排比角科斜跳搭角做法的形制类型如下表[表一]。

[表一]角科塔角形制类型

A	栱头(搭角闹翘)，其上三才升完全咬合横栱	
B1	B1型小栱头，其上三才升浅咬合横栱	
B1S	B1S型小栱头，其上三才升深咬合横栱	
B2	B2型小栱头，其上三才升贴于横栱内侧	
C	切几头，明清案例中，无论栱头造型，如原构无三才升者即视为切几头	
D	昂头(搭角闹昂)，2D代表闹头昂上再承一层昂头	

2、昂头昂嘴形状基本类型及编号如下[表二]：

[表二]昂嘴形制类型

I	扁弧形(例如北京孔庙先师门、北京大觉寺)	
---	----------------------	---

① 因缺少时代变化或缺少实际案例，《营造法式》列栱形制中有两种形制不参与比较：一、令栱与瓜子栱出跳相列承替木头或椽檐方头。二、角内足材下昂造即与华头子出跳相列。

II	高弧形	
III	额角宽矩形	
IV	额角窄矩形	
V	倒梯形	

3、角科横拱连身做法基本类型及编号如下：

- L1 横拱不相连(仅见与唐、五代和宋、辽中前期实例)
- L2 横拱连身做鸳鸯交手拱
- L3 横拱连身隐刻鸳鸯交手(此型在本文标尺中未见，但在见于午门部分亭阁)
- L4 横拱连身但不做鸳鸯交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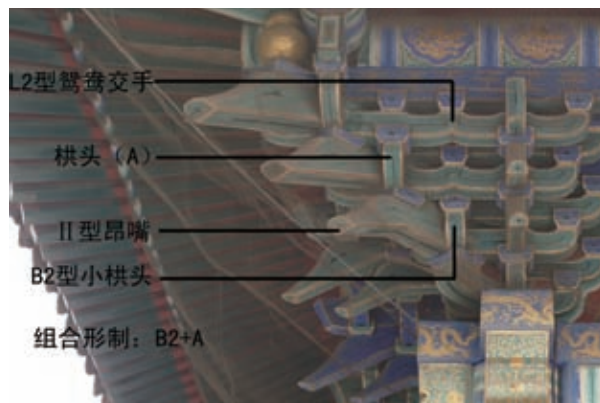
三 标尺建筑形制排比

依据建筑的历史沿革清晰度和原构保存状况，本文选取了北京的宫殿、坛庙、有官方背景的寺庙以及北京以外的皇陵等处共计43座标尺建筑〔图一〕，在表格中以编号的形式列出其角科斗拱斜跳搭角做法、角科斜昂昂嘴形状(如柱头科昂嘴与角科不同，则单独列出类型编号)及角科横拱连身做法的形制类型，这些基本类型形制及其所形成的形制组合，成为排比分期的重要依据〔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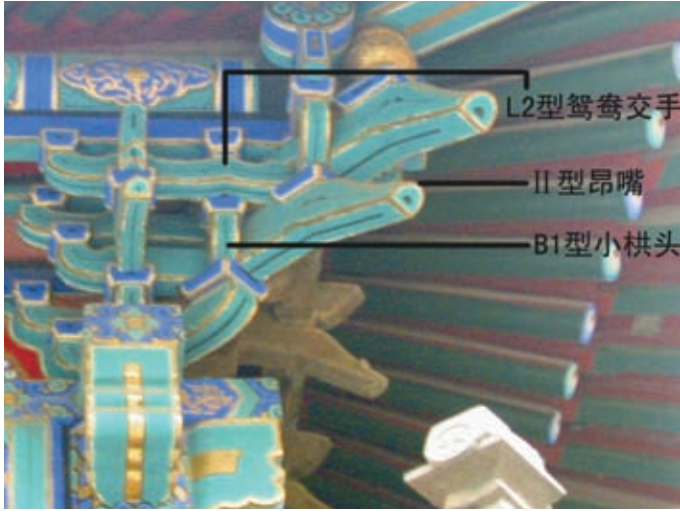
〔图一〕北京现存角科实例



01 北京孔庙先师门角科



02 北京社稷坛大殿角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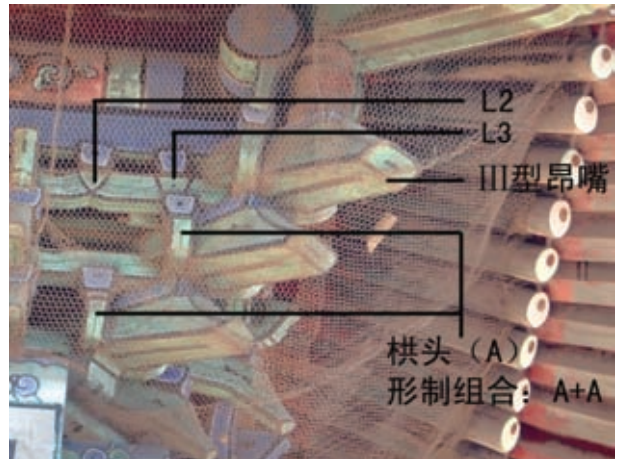
03 北京东岳庙瞻岱门角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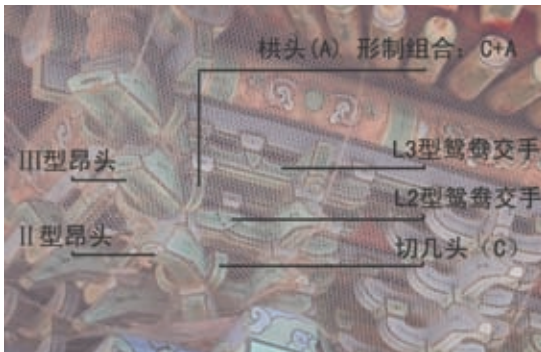
04 北京大慧寺大殿上檐角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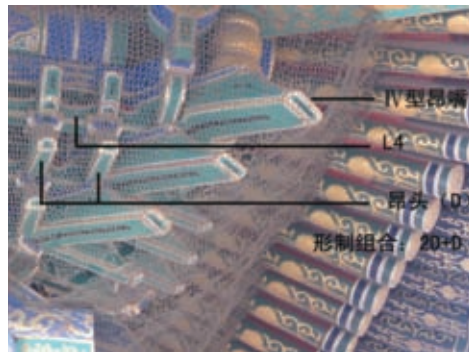
05 北京太庙戟门角科



06 故宫午门西南角阁角科



07 故宫午门东北角阁角科



08 故宫乐寿堂颐和轩角科



09 北京都城隍庙角科

〔表三〕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标尺形制表

建筑物名称	原构形制共存纪年	类型	斗拱踩数	斜跳搭角	昂嘴	横栱连身
北京孔庙先师门 ^①	永乐九年(1411)	坛庙	五踩	B2	I	L2
故宫角楼 ^②	永乐十八年(1420)	宫殿	上檐七踩	B2+A	II	L2
			中檐五踩	B2	II	L2
故宫神武门	永乐十八年(1420)	宫殿	上檐七踩	B2+A	II	L2
			下檐五踩	A	II	L4
故宫钟粹宫 ^③	永乐十八年(1420)	宫殿	五踩	B2	II	L2
先农坛太岁殿 ^④	永乐十八年(1420)	坛庙	七踩	B2+A	II	L2
先农坛拜殿	永乐十八年(1420)	坛庙	五踩	A	II	L4

① 北京孔庙元大德十年(1306)建,明永乐九年(1411)重建[清乾隆梁国治等编纂:《钦定国子监志》卷一〇“永乐初建庙于太学之东(《明史礼志》谨案:永乐九年庙成至十八年乃迁都)”,之后历经明清多朝修缮,但文献中没有明确提及现存先师门的更迭年代。从现存木构形制分析,先师门上的雀替、霸王拳等已属清式,但其斗拱布局较北京其他明代建筑疏朗宏大。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其为元代遗构(如姜东成《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但先师门的柱头科斗口明显宽于平身科斗口,这种形制是北京明清建筑的显著特点,而宋元建筑上罕见。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元代建筑无此形制标尺的前提下,尚不足以认定先师门为元代建筑,但其斗拱形制不晚于永乐之重建应无疑问,所以本文以公元1411年为先师门斗拱原构形制的共存纪年。

② 本表中各故宫建筑的年代未作专门注释者,皆取自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故宫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10月。

③ 郑连章:《紫禁城钟粹宫建造年代考实》一文,通过钟粹宫构架各部分的法式比较研究,认为钟粹宫为明早期遗构,本文是以永乐建成北京故宫的公元1420年为钟粹宫现存斗拱原构形制的共存纪年。

④ 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斗拱特点研究》一文,将先农坛太岁殿、拜殿和具服殿的年代皆定为嘉靖十一年,其依据应为《明史》卷四九(页1283,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4月。本文同源文献皆用此本)中所载嘉靖建太岁坛:“嘉靖十年命礼部考太岁坛制。礼官言:‘太岁之神,唐、宋祀典不载,元虽有祭,亦无常典。坛宇之制,于古无稽。太岁天神,宜设坛露祭,准社稷坛制而差小。’从之。遂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庑,夏、冬月将二坛。帝亲祭于拜殿中。”但这条文献的核心是嘉靖朝认为太岁是天神,应“露祭”,所以需要新建露天祭坛,并调整山川坛殿内原有祭位。但该文献未明确提及新建太岁坛大殿、拜殿之事。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曾仿南京制度建山川坛,《明史》卷四九(页1280):“永乐中,京师建山川坛并同南京制,惟正殿钟山之右,益以天寿山之神。”《明史》卷四八(页1249)记载嘉靖九年议天地祭礼时,礼部参考群臣意见后上奏:“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这份上疏一是认同天地分祭,二是提议利用现有建筑祭祀,以现有大祀殿屋祭“天”,以山川坛为地坛祭地,可以省去“创建之劳”。此文献说明,在嘉靖九年,永乐所建山川坛依旧完好地保存着,可以直接利用。所以,嘉靖改造山川坛露祭太岁等神时,实无必要重建大殿和拜殿。因此,本文以永乐十八年为今先农坛太岁殿、拜殿的原构形制共存年代。另,王世仁先生在《雪泥鸿爪话宣南》中指出,南京、北京的山川坛在殿内设坛祭祀太岁、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等神,今太岁殿仍为明代遗构,但并未明确现存殿宇的建造年代(《中国古建探微》页238-239,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嘉靖建太岁坛时仅建露坛的观点,亦见于诸葛净:《嘉靖朝之制礼作乐》,《建筑史论文集》第1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 亚白杨:《北京社稷坛建筑研究》一文在梳理相关文献后,亦认为社稷坛拜殿和戟门建成于明洪熙元年。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续〔表三〕

社稷坛拜殿 ⁵	洪熙元年(1425)	坛庙	七踩	B2+A	II	L2
社稷坛戟门	洪熙元年(1425)	坛庙	五踩	A	II	L4
明长陵祔恩门	宣德二年(1427)	皇陵	七踩	B1+A	II 柱头I	L2
明长陵祔恩殿 ¹	宣德二年(1427)	皇陵	上檐九踩	B1+2A+B1	II 柱头I	L2
			下檐七踩	B1+A	II 柱头I	L2
法海寺大殿	正统八年(1443)	寺庙	五踩	D	II	L4
智化寺如来殿万佛阁 ²	正统九年(1444)	寺庙	上檐七踩	B1+D	II	L2
			下檐五踩	B1	II	L2
东岳庙瞻岱门 ³	正统十二年(1447)	寺庙	五踩	B1	II	L2
宝禅寺大殿 ⁴	成化十二年(1476)	寺庙	五踩	D	II	L4
大慧寺大殿 ⁵	正德八年(1513)	寺庙	上檐七踩	2D+D	II	L4
			下檐五踩	D	II	L4
明长陵碑亭 ⁶	嘉靖二十一年(1542)	皇陵	上檐七踩	A+A	II	L2
			下檐五踩	A	II 柱头I	L4
太庙大殿 ⁷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坛庙	上檐九踩	B1S+2D+B1S	II	L2
			下檐七踩	B1S+A	II	L2

〈1〉 由于对相关文献理解的不同,长陵祔恩殿、祔恩门的建造年代目前存在几种观点:如李乾朗:《长陵祔恩殿》,魏玉清:《营建长陵与迁都北京》认为,祔恩殿建成于1416年;王铭珍:《北京的楠木殿》一文则认为是1424年;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斗拱特点研究》一文认为,祔恩门建于永乐年间(1403-1424);白汝博:《试论明长陵的建筑艺术》,闫凯:《北京太庙建筑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导师 王其亨)认为是1427年。本文据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页425、220宣德二年“三月己丑朔长陵殿成”,即以1427年为长陵祔恩门、祔恩殿斗拱原构形制的共存年代。

〈2〉 参见前揭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

〈3〉 《明实录北京史料(二)》页174、1028,正统十二年(1447)“闰四月丁亥 命工部右侍郎修东岳庙、城隍庙”;页174.1032,“五月戊申,遣工部右侍郎王佑祭司工之神。以修东岳庙兴工也”;页176、1047,“八月甲申,重建京城东岳庙成”。

〈4〉 宝禅寺大殿毁于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城建拆迁,所幸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保存了其柱头科和角科各一攒。明宝禅寺,工始于成化六年,落成于成化十二年,《敕赐宝禅寺新建记》:“成化庚寅岁……冬十一月兴工,首建佛殿,左右为伽蓝祖师堂。次建天王殿,左右为钟鼓楼。又次建山门……丙申秋月毕工。”

〈5〉 (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八:“明正德癸酉(1513),司礼监太监张雄建寺于宛平县香山乡畏吾村,赐额曰大慧,并护勅勒于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范铜为佛像,高五丈,土人遂呼为大佛寺。”页1632-163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以下同源引文皆用此本。

〈6〉 《明实录北京史料(三)》页331、974,“诸陵工所建造列圣碑亭并石碑俱完”。

〈7〉 参见 郭华瑜:《北京太庙大殿建造年代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3期;闫凯:《北京太庙建筑研究》页40,中殿草架上发现了明“嘉靖二十四年四月”题记。

续〔表三〕

太庙中殿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坛庙	七踩	B1S+A	II	L2
太庙戟门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坛庙	七踩	B1S+B1S	II	L2
大高玄殿大殿 ^①	嘉靖二十七年(1548)	皇家寺庙	上檐七踩	B1S+B1S	III	L2
			下檐五踩	B1S	III	L2
明定陵明楼 ^②	万历十八年(1590)	皇陵	上檐七踩	A+A	III	L4
			下檐五踩	A	III	L4
故宫西华门城楼 ^③	万历二十四年(1596)	宫殿	上檐七踩	B1S+A	II	L2
			下檐五踩	B1S	II	L2
明长陵明楼 ^④	万历三十三年(1605)	皇陵	上檐七踩	C+A	III	L2
			下檐五踩	C	III	L2
故宫坤宁宫	万历三十三年(1605)	宫殿	上檐五踩	D	III 柱头IV	L4
			下檐五踩	D	III 柱头IV	L4
故宫保和殿 ^⑤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宫殿	上檐七踩	C+A	III	L2
			下檐五踩	A	III	L4
故宫中和殿 ^⑥	天启七年(1627)	宫殿	七踩	A+A	III	L2
清孝陵隆恩殿 ^⑦	康熙三年(1664)	皇陵	上檐七踩	A+A	III	L2
			下檐五踩	A	III	L4
清孝陵明楼	康熙三年(1664)	皇陵	上檐七踩	A+A	IV	L2
			下檐五踩	C	IV	L2

① 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一(页639)引《明世宗实录》记载,大高玄殿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又据(明)杨爵:《杨忠介集附录》卷一所载,“丁未冬十一月五日……是夕上建醮大高玄殿火,肆发不可向迹”,可知大高玄殿于公元1547年冬十一月发生火灾。又据(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二《陈司寇传》记载,陈尧任营缮郎中时参与大高玄殿重建工程,“复建大高玄殿公入视工籍……”,其间淘汰冗员节约经费数十万,但工成时未得升迁,“久之,擢知台州府”,期间得罪乡贵而转任南安府一年,转任长芦转运盐使五年,任广西右参政两年,再任贵州按察使时故宫三殿灾(即嘉靖三十六年)。以此可知,在大高玄殿重建完工后至嘉靖三十六年时,陈尧在外做官有明确记载的时间为八年,加之在大高玄殿完工后未得升和在台州知府任上的时间亦应有一年左右,总计为九年,则反推大高玄殿重建完成的下限应为嘉靖二十七年,即公元1548年。由此可知,大高玄殿在公元1547年末火灾后立即得以重建,并于一年之内完工。本文据此以公元1548年为现存大高玄殿原构形制的共存纪年。

② 《明实录北京史料(四)》页202、1170,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庚申以寿宫成升监督工程官……”

③ 《明史》卷二〇《神宗一》页276,“二十二年……六月己酉,雷雨,西华门灾,敕修省”。

《明实录北京史料(四)》页259、1465,万历二十四年(1596)“八月壬寅西华门城楼工竣……”

④ 《明史》卷二〇《本纪二十·神宗一》,页284,“三十二年……五月癸酉,雷火焚长陵明楼。六月丙戌,以陵灾,命补阙官恤刑狱”。《明实录北京史料(四)》页336、1899,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己未,工部言:本月二十七日,长陵明楼合拢”。

⑤ 于倬云:《故宫三大殿》,《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

⑥ 上揭于倬云:《故宫三大殿》。

⑦ 表中所列清孝陵建筑年代,参见徐广源:《清孝陵营建和完工日期新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续〔表三〕

清孝陵碑亭	康熙七年(1668)	皇陵	上檐七踩	A+A	III	L2
			下檐五踩	A	III 柱头IV	L4
清故宫文华殿 ^①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宫殿	七踩	2D+D	III 柱头IV	L4
故宫太和殿 ^②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宫殿	上檐九踩	3D+2D+D	IV	L4
			下檐七踩	2D+D	IV	L4
故宫箭亭	雍正年间(1723—1735)	宫殿	五踩	D	IV	L4
清裕陵隆恩殿	乾隆十七年(1752)	皇陵	上檐七踩	2D+D	III 柱头IV	L4
			下檐五踩	D	III 柱头IV	L4
故宫乐寿堂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宫殿	七踩	2D+D	IV	L4
故宫颐和轩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宫殿	七踩	2D+D	III 柱头IV	L4
故宫皇极殿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宫殿	上檐七踩	2D+D	III 柱头IV	L4
			下檐五踩	D	III 柱头IV	L4
故宫宁寿宫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宫殿	五踩	D	III 柱头IV	L4
国子监辟雍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学宫	上檐七踩	2D+D	III 柱头IV	L4
故宫交泰殿	嘉庆二年(1797)	宫殿	五踩	D	III 柱头IV	L4
故宫乾清宫	嘉庆三年(1798)	宫殿	上檐七踩	2D+D	III 柱头IV	L4
			下檐五踩	D	III 柱头IV	L4
清东陵定陵隆恩殿	同治五年(1866)	皇陵	上檐七踩	2D+D	V	L4
			下檐五踩	D	V	L4
武英殿后殿	同治八年(1869)	宫殿	下檐五踩	D	V	L4
故宫太和门	光绪十五年(1889)	宫殿	上檐七踩	2D+D	V	L4
			下檐五踩	D	V	L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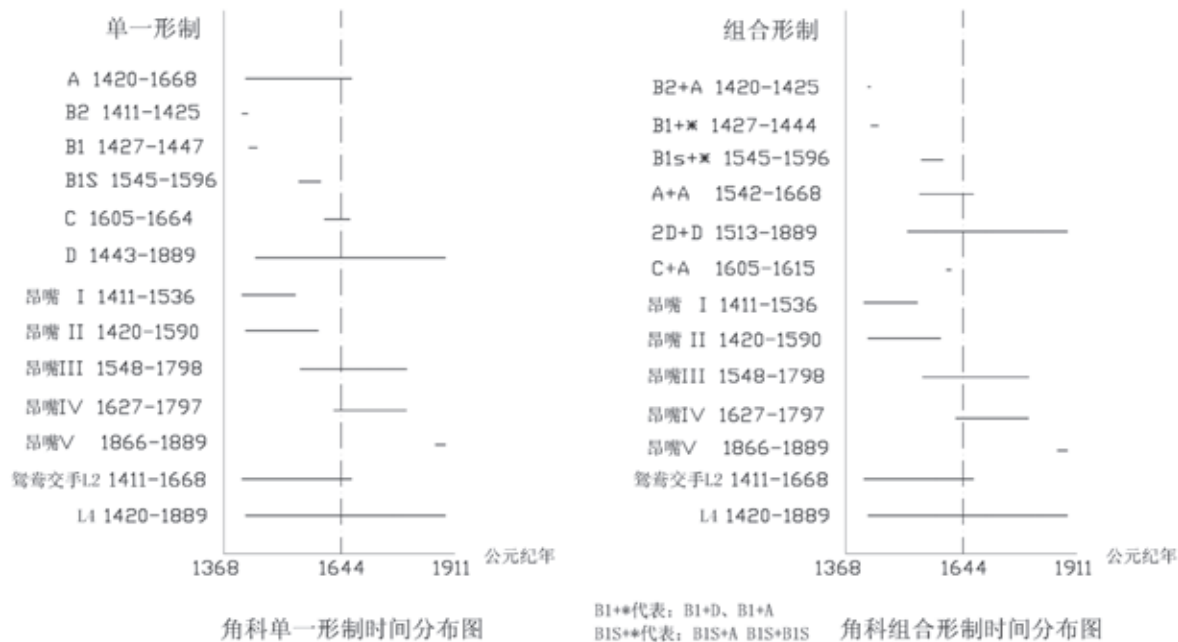
四 标尺形制分期

本文以标尺形制表中所列各原构形制的共存纪年，制成单一形制和斜跳形制组合类型的时间分布图〔图二〕。由于现存标尺实例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均匀，所以笔者将各类形制的起止时间点连接成

① 《国朝官史》卷一一，“文华殿康熙二十二年建”。

② 上揭于倬云《故宫三大殿》；又及，《国朝官史》卷一一，“太和殿，皇朝之正殿也。康熙八年重建，三十四年再建，深广各十一楹”。

[图二] 形制类型时间分布图(图中点划线表示明清分界)



线，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标尺实例现存状况对分期造成的影响。

在形制类型时间分布图的基础上，本文以单一形制类型或形制组合类型的出现、消失，以及形制类型的共存关系为界限，将明清时期北京官式建筑的角科形制分为六期[图三]。由于形制类型的起止点受现存标尺实例的局限，所以分期图中的分期线不代表形制变化的绝对临界点。

角科形制各期演变详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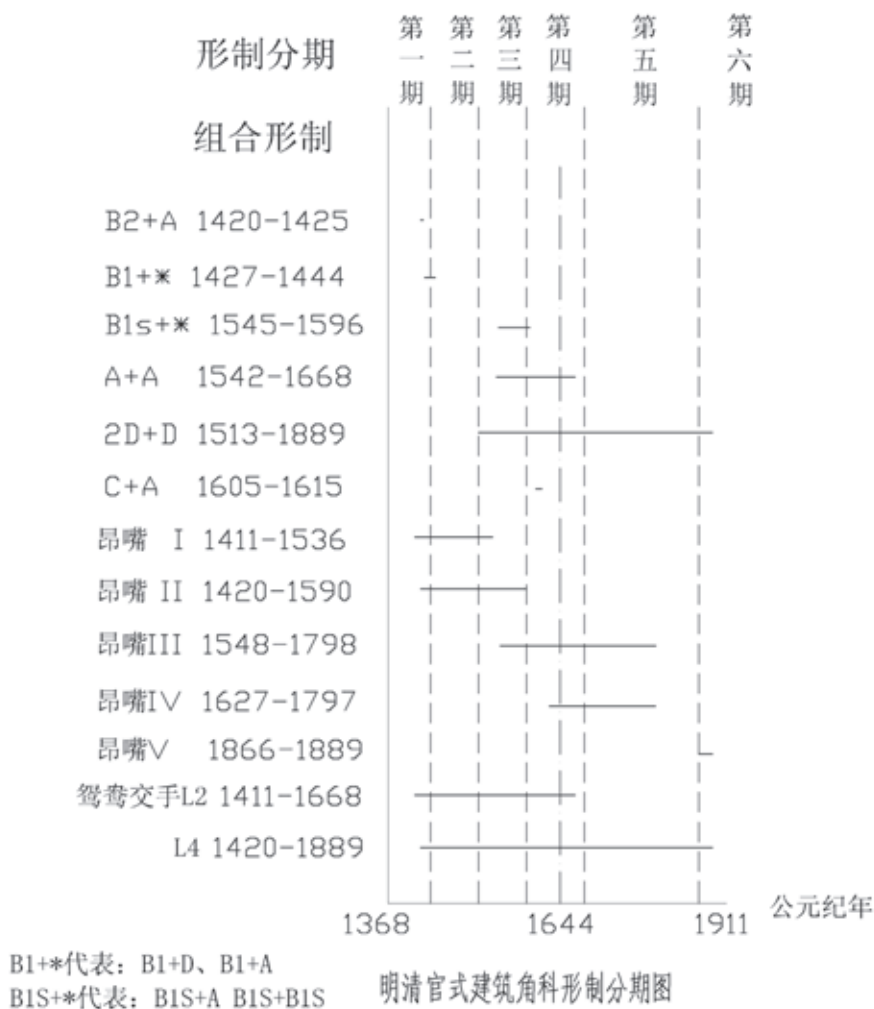
第一期：明永乐至正统时期

本期是元明交替期，这一时期的特征形制是，搭角拱头(A)、小拱头(B2、B1)共存，其中以B2型小拱头为主。七踩角科常见组合形制是：斜出第一跳搭角用B2型小拱头，斜出第二跳搭角用拱头(A)，形成B2+A的组合关系。薄弧的I型和高弧的II型昂嘴共存，其中II型已成为主流。作出鸳鸯交手拱身的L2型与不作鸳鸯交手的L4型共存，其中以L2型为主。从形制时间分布图上可知，B2、B2+A和I型昂嘴在北京明代建筑上运用成熟，但存在时间不长，应属明初所承的宋元形制。因此，从现存宋元建筑转角铺作斜跳上的B2、B2+A以及I型昂嘴的时空分布，我们就可探讨，各地转角铺作与明初北京官式建筑角科的亲疏关系，明确明初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斗拱的形制渊源⁴¹。

B2、B1和B1S型小拱头的主要区别在于，小拱头上所承三才升与横枋(鸳鸯交手拱)底面的关系，B2型小拱头的三才升贴于横枋内侧，仍为基本完整的斗。B1型之三才升顶面与横枋底边相

<1> 因本文篇幅所限，明初北京官式建筑与各地宋元建筑之间的关系将另撰文详考。

〔图三〕角科形制分期图(图中虚线表示分期界划,点划线表示明清分界)



交, 咬合深度不足拱宽的四分之一, 已变为平盘斗。B1S型小拱头上的三才升与横拱底面的咬合宽度为横拱底面宽度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三者相较, B2型是祖型, B1型是转变过渡型, B1S型是小拱头的成熟类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明代角科斗拱上, 拱头和小拱头形制长期共存, 不能认为拱头是小拱头的后续类型。同样, L2型横拱作鸳鸯交手与不作鸳鸯交手的L4型横拱之间, 共存于在明至清初时期, 所以形制断代时, 不能仅因L4型而判为清代建筑, 或认为L4型必晚于L2型。

第二期: 明正统一到正德时期

本期是明初官式建筑形制的重要转变期, 转变主要体现在: 1、B2型小拱头在本期未见实例, B1型小拱头仍承续第一期的发展。2、出现了闹头昂(D), 七踩角科斗拱出现了B1+D的组合形制。3、薄弧的I型和高弧的II型昂嘴共存, 但II型已占多数。横拱连身作鸳鸯交手(L2)与横拱连身不作

鸳鸯交手(L4)共存, L2型为主流形制。

B2型小棋头消失、以及闹头昂(D)的出现, 揭示出本期是孕育未来明清官式角科形制的重要转变期, 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实例较少, 使本期斜出搭角的主要形制B1, 在时间分布上, 与下一期主流形制B1S之间出现了百年的断层, 按常理分析, B1型存在的时间应后延, 而B1S出现的时间将前推, 但两者更准确的交接时段, 尚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第三期: 明正德至万历中期

本期是明代制度的成熟期, 期内出现了决定后代制度的重要形制, 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制特点是: B1S型棋头在本期占据主流, 但棋头(A)和昂头(D)的出现比例已明显上升。在七踩角科斗拱形制组合上, 出现了2D+D这一重要形制组合, 同时还出现了皆用棋头的A+A和皆用B1S型小棋头的B1S+B1S, 其中, A+A的组合一直延续到第四期。本期太庙大殿上檐九踩角科的组合形制是B1S+2D+B1S, 其与第一期明长陵祫恩殿上檐角科的B1+2A+B1和第五期太和殿上檐角科的3D+2D+D相比, 形制变化明显, 表现出显著的时代差异。本期前段多为II型昂嘴, 后段III型昂嘴出现并逐渐流行, I型昂嘴基本消失。横棋连身的L2型与L4型仍然共存, 虽然L2型虽仍占多数, 但L4型已明显增多。

本期在七踩斗拱上出现了上下两层斜跳搭角做法统一的趋势, 多见A+A、B1S+B1S和2D+D组合, 虽然2D+D在本期尚不占据主导地位, 但统一上下层斜跳搭角形制的趋势, 应可视作清康熙二十年以后北京清官式角科定制的滥觞。在上下层斜出搭角形制统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A+A和B1S+B1S组合, 因其存续期不长, 得以成为第三期至第四期间较为有效的断代特征, 其中, B1S+B1S应主要存在于第三期, A+A则从明中后期延续到清初。

第四期: 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

本期是明清交替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制特点是, A和A+A组合占据着明确的主导地位, 同时出现了C+A组合类型, 而未来清官式的主角2D+D型组合, 在这一期内未见有确切纪年的遗存^{〔1〕}, 由此判断, 此时其在明末官式建筑做法中仍居于次要地位。III型昂嘴在这一期成为主流, 但IV型昂嘴已经开始出现。横棋连身形制的L2、L4型共存, 其中L2仍占多数。

第五期: 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

本期是清官式角科形制的定型期, 角科斗拱最突出的形制特点是: 斜跳搭角作法统一为昂头, 五踩皆为D、七踩皆为2D+D, 九踩为3D+2D+D。III、IV型昂嘴共存, 但IV昂嘴更多出现在柱头科上。

〔1〕 北海大慈真如殿楠木造, 目前没有确切年代结论, 普遍认为是明代遗构, 有学者指出为明万历时期建筑, 其角科形制上檐七踩2D+D, 下檐五踩D, 上下檐昂嘴皆为III型, 柱头III、IV型, L4型横棋连身, 即不作鸳鸯交手。其形制符合明清角科形制第四期的特点, 如果排除建于清初的可能性后, 其形制年代上限为万历朝下限到明末, 建于明万历朝的可能性最大。相关文章如, 程昊森、张昕:《北海大慈真如宝殿和明长陵祫恩殿建筑特征分析与对比》,《中外建筑》2009年第8期;李铮:《平地起蓬瀛 城市而林壑》,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导师:王其亨)。

鸳鸯交手做法消失⁴¹，L4型成为唯一形制。这一时期现存最早的实例为建于康熙二十二年文华殿和三十七年的太和殿。由此可以推算，清官式的定型不晚于康熙二十年(1681)。

无论清初还是清代鼎盛的康雍乾三朝，除IV型昂嘴外，清代在角科斗拱上的形制皆源自明代北京的官式作法，甚至清代2D+D的广泛应用也符合明中后期以来(第三期、第四期)出现的统一角科上下层斜出搭角做法的发展逻辑，但是，清代何以选择在明代角科斗拱搭角做法上不占优势的昂头(D)以彻底取代常见的小拱头、拱头等其他形制，并使之稳定地延续了二百多年，这其中的种种因素，如社会制度、工官制度和审美观念等等，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

第六期：清同治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本期是清官式角科斗拱形制的微变期，也是明清角科形制发展的末期，这一时期，斜出搭角做法仍未改变，主要变化体现在昂嘴形制上，即倒梯形昂嘴(V型)成为主流，顶面略带弧线的倒梯形昂嘴时代稍早，其后以平直为主。清亡以后，这一时期的角科形制，在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中式建筑上仍有所延续，实例如燕京大学校门(今北京大学西门)等。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中国传统社会已渐瓦解的大背景下，在民国南京政府号召弘扬民族固有建筑风格的同时，北京官式建筑角科形制的自然发展脉络被历史潮流所悄然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由现代建筑师所主导的形制演变，此后再现的传统建筑形制，不再与形制本身的时空逻辑相关，而与建筑历史研究成果的应用、业主诉求和建筑师专业素养相关。

五 午门及奉先殿角科斗拱形制年代分析

清代相关历史文献，如奉旨编修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国朝宫史》、《大清会典》、《清实录》等，记载了清朝入主北京后，于顺治朝内重建了保和殿、午门、天安门、奉先殿、太庙、钟粹宫等大型皇家建筑工程，这些密集浩繁的工程与顺治朝尚不稳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极不相符，其真实性屡遭学者质疑，如于倬云先生曾指出，现存中和殿、保和殿仍为明代建筑²；郭华瑜亦论证了北京太庙前殿仍为明构³。于倬云先生认为，清人出于政治需要，故意混淆清初故宫的建筑活动，所以，研究者对于清初记为“重建”之故宫建筑，尤其要依靠法式分析其年代，以免受文献蒙蔽⁴。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形制分期为依据，对清代文献明确记载建于清初

〈1〉 清末，附角斗之厢拱与角科厢拱之间仍存鸳鸯交手作法，实例如武英殿后殿。

〈2〉 于倬云：《紫禁城始建经略与明代建筑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3期。

〈3〉 郭华瑜：《北京太庙大殿建造年代探讨》。

〈4〉 于倬云先生在《故宫三大殿》一文中称，“有些人片面的根据文献，缺乏法式分析，把中和殿等列为清代建筑。认为许多殿都是‘清顺治二年重建’。……把保和殿与中和殿注为清代建筑，是值得商榷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志典录，为了夸大清朝的‘成就’，污蔑农民革命的正义，把焚毁房屋的罪名加在李自成的身上，今从建筑的法式上看，故宫里现存明代的遗物实仍为数不少”。

的奉先殿和午门加以考察，详见下表〔表四〕。

〔表四〕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形制分期与清代文献对照

建筑	清代存疑文献	角科及昂嘴形制类型	期属	文献出处
奉先殿前殿	顺治十四年告成前殿七楹后殿如之凡 世祖章皇帝肇立奉先殿于宫左庸展孝思	上檐九踩: B1S+A+A III 柱头II、IV 山面II、IV L2 下檐七踩: B1S+A III 柱头 II、III、IV L2	第三期，上下檐主要构件同期，第四至第五期间有扰动	《国朝宫史》 ^① 卷13 《国朝宫史》卷11
奉先殿后殿	同上	七踩: 2D+D IV L4	第四至五期	同上
午门大殿	午门顺治四年建	上檐九踩 A+2D+A II L2 下檐七踩 A+A II L2	第三期	同上
午门东北角阁	同上	上檐七踩 C+A III L2 L3 下檐五踩 A III由昂IV L3	第四期	同上
午门西北角阁	同上	上檐七踩 B2+B2 昂嘴II 柱头I、III L2 下檐五踩 A 昂嘴 III L2	第一期 有第三至第四期间的扰动	同上
午门东南角阁	同上	上檐七踩 A+A IV L2 下檐五踩 A IV L3 ^②	第四期	同上
午门西南角阁	同上	上檐七踩A+A III柱头IV L2 L3 下檐五踩B1S III柱头IV L2	第三期 有第四期至第五期间的扰动	同上

（一）午门及四角亭阁角科斗拱年代分析

据上表的形制分期结论可知，午门现存正殿的角科形制为第三期，同时，明天启和清顺治的重修^③，在午门正殿上留下了第四至第五期形制扰动的痕迹。午门周边四座角阁的角科斗拱形制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西北角阁的角科形制最早，为第一期；西南角阁为第三期；东北和东南角阁同为第四期；其上限为明晚期，下限为清初，此二阁存在清顺治重建的可能。但据《午门建筑艺术》记载，曾在午门东北角阁内发现“极类明代手法”的彩画^④，如彩画确为明代，则可证明形制较晚的东北角阁亦不晚于明朝末年。清顺治时期对午门建筑施加的影响，应主要体现在砖瓦、油漆彩画和小木作之上，《国朝宫史》中“午门顺治四年建”的记载，与不同时期做法混杂的现状不相吻合，难免虚夸之嫌。

① 《国朝宫史》，乾隆七年内廷翰林奉敕编修，乾隆二十六年成书。

② L3型横栱连身即在厢拱上隐刻鸳鸯交手，在北京明清官式建筑上仅见于明清交替期，其出现应与小栱头消失有关，可视作L2型鸳鸯交手栱在消失前所出现短暂过渡类型。

③ 王璞子：《午门建筑艺术》，《紫禁城》1983年第1期。

④ 王璞子：《午门建筑艺术》，《紫禁城》1983年第1期。

检诸史料，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午门被焚¹，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兴工重建午门²，三十七年(1558)六月完工³。这次重修恰与午门正殿和西南角阁的角科形制分期相吻合。由文献和形制的互证可知，现存午门大殿和西南角阁的角科斗拱仍为明嘉靖三十六年重建之物，而东北、东南角阁之角科已经明末清初的重修，非嘉靖原构，同时，嘉靖重建午门西北角阁时，至少保留了角科斗拱等明初构件。又，万历四十五年(1617)正月，“东朝房失火，户科等衙门朝房被焚，自午门延及公生门，尽为烧毁”⁴。这条文献所记述的万历年间午门东侧的火灾，似可印证今午门东侧角阁建筑形制晚于西侧角阁的原因。

(二) 奉先殿角科斗拱年代分析

清代文献记载顺治皇帝“肇立奉先殿”，并且有一系列文献记载其建造过程，受其影响，目前学者普遍认为李自成烧毁了明代奉先殿，现存奉先殿为清初所建。其中多数学者认为，明清两代奉先殿格局一致，皆九间殿⁵，但也有学者认为，明代北京故宫奉先殿为五间，清初重建才改为九间⁶。

《紫禁城内奉先殿修建概略》⁷一文列举了清顺治、康熙朝有关奉先殿工程的文献，并指出这些文献之间存在的矛盾。首先，《清实录》、雍正朝《大清会典》中记载了顺治十四年(1657)为“营建”奉先殿而祭告宗庙，之后，又有竖柱、上梁、安鸱吻等多次祭神活动。但工部尚书穆里玛在其满文奏折中称奉先殿工程为“修理”而非“营建”，奏折主要内容是：因修理奉先殿时所需钱粮多，特向皇帝奏请暂停鼓楼等处各项工程，伺工部钱粮储够后再行开修。其次，清《皇朝通志》中记载，顺治建奉先殿九间，与《大清会典》等文献所记载的七间不同。最后，雍正朝《大清会典》中记载康熙十八年又“重建”、“恭修”奉先殿，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了奉先殿工程安柱顶石、上梁等事，并于康熙二十年告成。《紫禁城内奉先殿修建概略》一文认为，故宫现存奉先殿建于清顺治，文献中的“七间”仅指殿身，另有东西夹室，合为九间，与现存规模相同。康熙时的“重建”只是添建前后殿之间的穿廊，其工期因宫内火灾而耽误长达两年。

¹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一〇《物异考·火灾》：“(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丙申，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文武二楼、午门、奉天门俱灾。”

² 《明实录北京史料(三)》页491、1700，嘉靖三十六年“八月丁未重建午门兴工”。

³ 《明实录北京史料(三)》页498、1731。

⁴ 《明实录北京史料(四)》页445、2480。

⁵ 许以林：《奉先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刘鸿武：《紫禁城内奉先殿修建概略》，《历史档案》2009年第3期。

⁶ 参见诸葛净：《嘉靖朝之制礼作乐》，《建筑史论文集》第1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前揭闫凯：《北京太庙建筑研究》。

⁷ 奉先殿工程的相关清代文献详见前揭刘鸿武：《紫禁城内奉先殿修建概略》。

在《紫禁城内奉先殿修建概略》一文所列举的清代文献中，“营建”、“修理”和“重建”等词汇混杂，含义不清。最具史料真实性的当属顺治朝工部尚书穆里玛的满文奏折，其中所表达的钱粮紧缺之情况，也符合清初的历史背景。要确定现存奉先殿的建筑年代，诚如于倬云先生所言，要注重形制分析，而不能仅依靠自相矛盾的清初文献。

据本文分期，奉先殿前、后殿角科斗栱的形制期属分别为：前殿角科为第三期，即明正德、嘉靖至万历中后期。后殿角科为第四至第五期，即明万历晚期到康乾时期。

与奉先殿前殿角科斗栱分期结论相印证的文献见于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七年十一月(1538)，“武定侯郭勋以奉先殿等各宫殿工缺官督视”¹；嘉靖十八年正月(1539)，“奉先殿成，升赏效劳诸臣……于是工科给事中……各疏言：诸臣升赏太滥……又如郭文英、李良贵者，徒以匠作蒙被恩遇，不二三年致身卿佐……上以工完加恩亦系常典……郭文英、李文贵实有劳绩，准升赏”²。

奉先殿与太庙功能相近，在嘉靖朝兴工的日期亦非常接近，且从役大匠同为嘉靖帝所倚重的郭文英³，从这些迹象可知，奉先殿工程应是嘉靖“庙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者多关注嘉靖十五年太庙的改建⁴以及奉先殿周围崇先、观德、奉慈等殿的兴废沿革，而忽略了嘉靖对奉先殿的动作⁵。嘉靖十五年罢奉慈殿祭，十七年罢崇先殿祭，其神主如嘉靖父母等并入奉先殿祭祀。嘉靖十八年初完工的奉先殿，建筑营造的时间与奉先殿大规模扩充祭祀对象的时间正相吻合。奉先殿工成后，嘉靖帝力排言官上疏，坚持封赏大批相关官员和工匠，由此可知，奉先殿工程规模浩大且皇帝给予了高度关注。因此，此次奉先殿工程为重建的可能性很大。自嘉靖十八年初奉先殿告成以后，直至明末，未见奉先殿毁灭或重建的记载。

从现存建筑形制和清初各种“重建”文献分析，笔者以为奉先殿现状的合理解释是：嘉靖重建之奉先殿，在李自成焚烧故宫时遭到了破坏，后殿已毁而前殿独存。顺治、康熙朝“重建”工程的内容是：修理前殿，重建后殿。虽然现奉先殿前殿的小木作门窗、彩画等已是清制，斗栱上也可见一些清代重修时留下的扰动构件，但前殿斗栱仍多为嘉靖原构。

1 <1> 《明实录北京史料(三)》页300、817。

2 <2> 《明实录北京史料(三)》页302、826。

3 <3> 《明实录北京史料(三)》页364、1139，嘉靖二十四年(1545)七月丁丑：“初，工部匠作官郭文英，积功劳升至工部右侍郎，荫其子文思院副使，至是以庙功加恩，再升俸级，因上疏辞俸，乞升荫其子。……于是给事中张元冲劾奏……疏入，上不悦，曰：名器不可不重，工役亦须得人……再论者罪之。”

4 <4> 《明实录北京史料(三)》P283 .717。

5 <5> 诸葛净：《嘉靖朝之制礼作乐》一文对奉先殿及周边观德、崇先、奉慈等殿的格局复原，与于倬云《紫禁城始建经略与明代建筑考》、许以林《奉先殿》、刘鸿武《紫禁城内奉先殿修建概略》及杨新成《明代奉慈殿兴废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的研究观点相左，诸葛净认为明代北京故宫奉先殿始终为五间。本文认为，依据形制和文献分析，至迟到明嘉靖十八年(1539)，故宫奉先殿已为九开间建筑。

（三）嘉靖大匠郭文英

《陕西通志》引《韩城志》记载¹：“郭文英，韩城人。少为人牧羊，以户匠乏人，至京抵役。久之，以巧力闻见知世庙，每一工竣，则序劳晋秩，累阶至工部右侍郎，赐二品服。文英聪慧善诙谐，尝会诸缙绅，谈及发科经书，辄笑，自谓不佞起家木经，众为绝倒。”

郭文英具体生卒年月不详。隆庆元年(1567)，礼科给事中辛自修上疏，以郭文英由工匠进身而论夺其谥号²，由此可知，郭文英死于嘉靖朝。1545年，郭文英已官至工部侍郎，子嗣荫官，以常理推算，则郭文英大约生于明弘治年间。

嘉靖皇帝热衷于建筑营造，现存明清北京城的外城、午门、太庙、四郊坛庙、大高玄殿等许多重要建筑，重建或新建于嘉靖时期，郭文英以精湛的木工技艺，生逢其时，成为嘉靖朝最杰出的工匠，深受皇帝的爱护和青睐³。面对科举士大夫的鄙视，郭文英亦能谈笑自处。从明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上看，郭文英正处于明官式建筑的成熟期，上承蒯祥遗范，下播嘉万新风，其所参与建造的奉先殿、太庙等皇家建筑，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郭文英在明清建筑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贡献，绝不在蒯祥、徐杲、雷金玉等名师之下，是当之无愧的哲匠，应给予足够的重视⁴。

结 语

通过对角科斗栱的形制分期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两个层面的认识。

一是“物”，即通过对建筑形制的研究，细化了明清官式角科斗栱的演变历程，明确了一些形制及形制组合的时代性，其结论可用于明清北京官式建筑的年代鉴定，例如，故宫集福门(B2+A II L2)、太庙井亭(B2+B2 II L2)和故宫南薰殿(B1 II L2)，按其角科形制分析，集福门和太庙井亭皆属第一期，即明永乐至正统年间。南薰殿的形制跨越第一、二期，上限为永乐晚期，下限不晚于正德，

〈1〉 雍正版《陕西通志》卷六四。

〈2〉 《明史》卷二二〇《辛自修传》：“未几，论夺尚书顾可学、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赠谥；以可成由黄冠，文英由工匠，可学、隆禧俱以方药进也。”页5798—5799。

〈3〉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一：“二品赐玉带……嘉靖中，非一品而赐者，大学士袁宗皋，尚书邵元节、陶仲文、郭文英也，元节以下皆异流。”

〈4〉 胡平：《明清江南工匠入仕研究》（苏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导师：余同元）页82“附表1：哲匠录人物收纳汇总表（明代·营造）”中，录郭文英之名，但“贡献”一项填为“不详”。

佐以南薰殿在明代延续的史料^{〔1〕}，则现存南薰殿很可能是一处永乐十八年至景泰元年之间(1420-1450)的遗构。文物建筑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其历史价值，而历史价值的基础是建筑的建造年代和修缮沿革。对于北京明清官式建筑而言，目前仍有许多建筑的建造年代和修缮沿革需做进一步梳理，乃至重新认知。

二是“由物见人”，从物质的变化而见历史的变化、精神的变化，从而使古代建筑的研究纳入历史研究之中。在中国建筑史上，“明清”常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从本文分期则显现出，明清之间在形制演变频率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明代官式建筑在角科斜跳搭角这一形制点上，前后有十余种形制类型，而清代自康熙二十年至清亡的二百多年间，斜跳搭角上竟始终仅用一种形制，而且这种仅有的形制也继承自明代。换言之，在角科斗拱形制上，明继承宋元同时有所发展变化，而清裁剪明制，罕有创造。

明代的演进与清代的凝滞，自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而这宏大的历史命题，是否就物化在明清建筑那优美的檐角之下，在北京的空中，守望着这座城市，拷问着后人？

后记：2005年，笔者在所开设的建筑形制类型学课程上，指导研究生对北京明清建筑的外檐形制进行了分期研究，参与此课程学生的研究生为陈瑞、黄晓帆、张薇薇、蔡宇坤、杨非。另本专业学生崔金泽、谭镭、余莉娜，亦对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有所贡献。最后，衷心感谢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先生、方道先生和杨新成先生对笔者研究工作的帮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张 露)

〔1〕 南薰殿在明代的史料见于：(清)万经：《分隶偶存》卷下“张端将乐人少有才名景泰间(1450-1456)以荐授铸印局使，直南薰殿”；(明)黄佐：《翰林记》卷六“天顺四年(1460)四月十六辰刻，上御南薰殿召尚书王翱、李贤、马昂，学士彭时、吕原五人入侍”；(明)陆深：《俨山集》卷八〇嘉靖十五年(1536)“八月南薰殿书太祖、成祖、睿宗三圣王册宝，赐银币”。现存南薰殿形制早于嘉靖时期，未见明天顺至正德年间有重建南薰殿的记载。

On Model System Evolution of Corner Corbel-Bracket Set of The Ming-Qing Official Buildings in Beijing: Additionally on The Model Ages of The Bucket Arch on The Corner of Wu Men and Fengxian Dian of The Forbidden City

Xu Yitao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06 to 023.

ABSTRACT: The author tries taking typological methods in this thesis to subdivide the system of corner corbel-bracket set in the official construct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to three groups on shape grounds including 15 models and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It accordingly analyzes sets of bucket arches concerning models and years when they worked together via 43 Ming and Qing official buildings, hereby to outline 6 stages spanning over 500 years'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buildings in Beijing covering: 1) the turn from the Yuan to Ming period, 2) the transition to the Ming system, 3) the maturation period of the Ming system, 4) the turn from Ming to Qing regime, 5) the stable period of the Qing system, and 6) from end of the Qing regime to Bei Yang Government when the bracket set system started to change in a way. Additionall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ges of the architectures like Wu Men (Meridian Gate) and Fengxian Dian (Hall of Ancestral Worship) inside the Forbidden City by reference of what has been summarized above and related archives.

KEY WORDS: the Ming & Qing periods; Beijing; official buildings; bracket set on corner; different stages; the imperial palace; Fengxian Dian (Hall of Ancestral Worship); Wu Men (Meridian Gate); Guo Wenying

